

自由

及其

幻象

当代城市
休闲消费
的发生

陈占彪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自由及其幻象

——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

陈占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及其幻象：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 / 陈占彪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264 - 2

I. ①自… II. ①陈… III. ①消费经济学—研究—中国
IV. ①F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41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自由及其幻象

——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

陈占彪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64 - 2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3

定价：86.00 元

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
总体的系统中，不存在对时间的自由
支配。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
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目 录

绪章 从劳动到休闲 1

第一节 为了劳动而休闲 1

第二节 为了休闲而劳动 23

第三节 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 34

第一章 “城市工作中心主义”与休闲生产 41

第一节 逃离城市 41

第二节 城市人为什么如此忙碌 48

第三节 从工作到做工 84

第四节 必需的休闲 94

小结 100

第二章 何处休闲：都市休闲空间分析 102

第一节 “去自然”的城市化 103

第二节 被圈占的休闲空间 122

第三节 被出卖的休闲空间 125

第四节 休闲权利与政府职责 138

小结 152

第三章 观念诱导、时间创设和文化造景 155

第一节 旅游向来有，意义各不同 156

第二节 观念之变：服务与享受 190

第三节 腾挪时间 209

第四节 文化造景运动 221

小结 232

第四章 旅游消费是如何发生的 236

第一节 消费构成与旅游报价 236

第二节 骚动的必要消费 245

第三节 额外消费的秘密 256

小结 296

尾章 挣脱禁锢与节制发展 307

第一节 休闲的牢笼 307

第二节 “多快好省”的发展观 324

第三节 厌游与回归 340

名词释义 345

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57

绪章 从劳动到休闲

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分界点”。人们的很多思想观念在此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指导思想、阶级/阶层地位、分配制度、财富观、价值观等。劳动和休闲这对词语的意义也是如此。以前，我们尊崇劳动，休闲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劳动；今天，我们拥抱休闲，劳动目的是为了更痛快地休闲。

今天，据说一个“普遍休闲”的时代已经来临。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无可否认，“休闲”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生命的重要一部分，而与以前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生活现象。那么回顾和分析我们对休闲/劳动在1978年前后几乎是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助于对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休闲”的背景和脉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第一节 为了劳动而休闲

“劳动瘾”与“劳动光荣论”

“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罗素认为现代世界中大量的危害源自大家相信工作的“善良性”，他反对那种将吃苦受累视为人生的美德的看法^①，因此他说，如果你去问一个人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的话，他绝不可能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感到我是在履行人的最崇高的使命。再者，因为我喜欢想象人到底能够把他的行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我的肉体需要一

^① 亚里士多德也持有此种看法，他认为“闲暇比勤劳高尚”。〔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0页。

段休息的时间，届时我还得设法让它不至白白度过，但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要算是当早晨来临，我能够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累活之中了。”^①

可是在1954年，中国作家魏巍就听到了罗素自以为一定会听不到的话。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四周，魏巍遇到许多辛劳了一世的退休“老工友”。他们享用着每月按时领发的退休金，又有强壮的儿子在劳动，他们还有宽裕的时间栽种花木，把家庭收拾得十分舒适。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地都在发牢骚说：“厂子里不要我啦。他们光看人的年纪大不大，就不看人家的胳膊怎么样！”他们伸着腿，扬着胳膊叫人看。“这叫什么生活！一天价闷在家里，憋得没法到卢沟桥上去数狮子头，这么下去，就说是铁，也要生锈呵！”^②

于是，这群闲不住的退休工友在永定河岸上种出一片片树林，开出一块块荒地。

魏巍还说有一个师政治委员，他负过重伤。“连年累月的劳动，使他的身体衰弱了。特别是某次一连几个昼夜没有一刻休息的劳动，使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休养刚一好转，就又投入工作，身体越发不可收拾，不得不躺在医院。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是多么的苦恼呵。他说，他再不能忍受这休养的生活……他说：‘我的脑子坏了，不能做思想工作，还可以去开拖拉机。’”^③

退休的工人闲不住，乡村里上了年纪的，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民同样如此。“他们极少是在那儿静坐的。他们不是磕磕绊绊地去喂猪、喂鸡、就是用粗筋隆起的老手，抖抖颤颤地从墙上取下一缕麻来，坐在那里搓麻。”而他们不歇的理由是人能静坐静吃等死吗？

我们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看到类似的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① [英] 伯特兰·罗素著，李金波、蔡晓译：《悠闲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②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国青年》1954年第23期。楼适夷也说到这种“闲不住”的退休工人。他说：“即使是千千万万的平凡的劳动者，例如退休的老工人，受到国家的供养，解除对社会的责任，儿女自立，生活无忧，很可以晒晒太阳，聊聊闲天，抱抱孙子，喝杯二锅头，享享清福，悠游度日了。却还恋恋不舍地尽往原来劳动的工厂里跑，谁也不叫他干活，他还总是这边看看，那边动动，就是在地面上拣些钉头钉脑，收集起来，交给仓库，也感到分外高兴。他们是懂得劳动的乐趣和工作的幸福的。”楼适夷：《工作着是幸福的》，《八小时以外》1982年第1期。

③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国青年》1954年第23期。

我们访问新西伯利亚的老工人那乌莫夫时，他这样说：“如果我不劳动，我就感到寂寞。”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厂，一天也离不开她。他的母亲七十三岁了，去年还要求工作。巴库七十四岁的老工人阿里也夫，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几次拒绝了退休，而且现在还进行着第十八个重要的发明。^①

在一个人人以“劳动为荣”的时代里，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也第一次感到羞愧。在陈学昭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可以看到“不劳动者”在劳动社会里的格格不入和自我反省。小说主人公“珊裳”是一个懂法语的小知识分子，在延安的时候她开始努力学着用那双“弹钢琴的手”笨拙而艰难地纺线。

坐在纺车边的日子愈多，时间愈久，她的思想跟着那一根一根的线抽出来，愈抽愈长，愈抽愈多。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出过一粒米，但却已穿过不知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为自己这一新的思想觉得惊奇，由惊奇而感到羞惭，由羞惭而感到负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②

虽然知识分子写文章、教学、翻译，甚至弹钢琴也是劳动，但从此也可以看出，代表了众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珊裳们”在从事实际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面前那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再想想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斥他为没有出息的“小人”时，就可以明白这种“脑体倒挂”的“革命性”了。

劳动成瘾。恍若隔世。对劳动欲罢不能，而对休闲难以忍受，世上竟有这样的人？恐怕这种现象不光在改革开放后，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很鲜见。

① 梁步庭：《我所看见的苏联青年》，《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20世纪30年代，林克多以“第一人称”杜撰的《苏联见闻录》中也记录着苏联莫斯科电机制造厂老工人的劳动热情。“在我工作间内，有一苏联老工人，年已六十七岁了，照劳动保险条例，已在养老时期，但他精神矍铄，技术高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工作，每日工作七小时。经职工联合会与区苏维埃的劝告，叫他去养老院去养老，他总不愿意。他说：‘青年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不允许老头子参加吗？我现在身体还健安，技术也有一些，在国家正当缺乏技术人才的时候，我继续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所应有的责任，凡是青年人做得到的工作，我也会做到。’后来经党部书记几次的劝告，他才允许每日工作四小时。”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大光书局1935年版，第297页。

②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可是在旧时代，劳动向来都是“卑贱”的。

人们说：“劳动是人类最高尚的事，应该得到人们的赞美和歌颂，劳动者是人类中最高贵的人，尤其是从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人，多半是看不起劳动，好像劳动是下贱的事，看不起劳动者（工人、农民），好像劳动者要低人一等。这种对劳动、对劳动者的看法和态度，是完全不正确的，那是受了剥削阶级观点的影响。”^①

凡勃伦就说到“剥削阶级”是如何鄙视劳动的。他说：

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为的。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感到劳动是要降低品格的，这种观念相沿至今，并没有消失。^②

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难道不是“天下之通义”吗？这便是“劳动者流汗，统治者吃肉”的道理。“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谁愿意做泥瓦工呢？

“卑贱”的劳动自然有碍面子、尊严、身份和地位，因此有些人无不以不参加生产性的劳动为荣，无不以从事生产性的劳动为耻。“有闲阶级生活的主要特征是明显地不参加一切有实用的工作”，因此“上流社会对于粗鄙形式的劳动，很少不是本能地感到厌恶的”，他们认为“拒绝劳动不仅是体面的，值得称赞的，而且成为保持身份的、礼俗上的一个必要条件”。于是就出现了只有“寄生虫”才足以体现自己身份的现象，寄生的本领成为人们显摆的内容。“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正相反，从事于生产劳动既然是贫困与屈服的标志，它同在社会上取得崇高地位这一点就冰炭不相容了。”^③

凡勃伦讲了这样的一例子，有位法国国王烤火，眼看着炉火越烧越旺，而为其专司移座之职的仆人恰巧不在，然而这个迂腐而固执的国王认为移动其尊

①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下），《中国青年》1949年第13期。

② 〔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页。

③ 同上书，第31—33页。

贵的屁股有损尊严体统，于是宁可被火熏死，也不愿移动一下座位！“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玷污。”上层社会对劳动的反感和恐惧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从小就听过因不愿意转动一下脖子上的烧饼而最终饿死的少爷的故事，这一夸张的故事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懒惰，不如说反映了他的寄生性。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有分析几乎都可以从“劳动卑贱论”中得到理解。他所说的“有闲”指的“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不生产而有人供养，这才算本事，有此种本事的人就是有闲阶级。“要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1）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2）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坐食无忧。”^①

在高度重视与提倡体力劳动的特殊年代，“不事直接生产”的精神劳动者曾错误地被当作批判的对象，我们从1968年对“有闲阶级”齐白石为“有闲阶级”画的“黑画”的讨伐中，可以看出在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里，对“不事直接生产”的“有闲阶级”的态度。《荷乡清暑》是士大夫在开满荷花的池园里赏荷，沉湎于闲情逸致，反映齐白石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大寿图》则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三年自然灾害时竟成了‘可以作为祝寿的礼品’。这种‘全民文艺’的出版物究竟为谁服务，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至于那些不题字和诗的花卉草虫鱼虾作品，则是齐白石寄生生活写照，更是有闲阶级消闲生活的点缀品”^②。齐白石的画之所以被批为“黑画”“毒草”，在于其事关消闲，无关劳动，更确切地说是无关体力性的、直接生产性的劳动。这种批判无疑是错误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可足见当时人们对劳动的普遍认识。

“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劳动的胜利。……热爱劳动还是轻视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思想体系不相同的根本问题。”^③不管人们以往对劳动如何贱视，在新中国，人们的“劳动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思想观念上看，“劳动最卑贱”一举变成“劳动最光荣”；从阶级地位上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而统治者、资本家、劳心者都夹起了尾巴，不

① [美] 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36页。

② 转引自李辉：《拼贴风中碎片（五）——追寻“文革”初期的美术风云》，《书城》2009年3月。

③ 刘导生：《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

再“食于人”，而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者”；从分配原则上看，劳动，而非资本、土地或其他要素成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当然，人人都知劳动光荣的“大道理”，但并非人人都有光荣劳动的自觉。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一大批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到农村去当农民参加生产时，很多人才觉得真要去“光荣劳动”时，又忧心忡忡，退避三舍。“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也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做脑力劳动者，不愿做体力劳动者。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将就着去做大工业的工人，不愿做学徒，不愿做手工业工人，不愿做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尤其不愿做农民。”^①可见，即使在劳动光荣的口号震天响的时代里，要根本扭转“劳动卑贱”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工人游行队伍

图片来自《人民画报》1卷1期（1950年7月）

① 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4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不过,总的来说,“劳动”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政治、道德的基础,“劳动光荣论”的观念已经深植人心,这也是那些本该安享清福,辛苦了一辈子的工人为什么闲不住,一闲下来就闷得慌的原因所在。

劳动价值观之必然

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将“劳动”,放置到如此“神圣的”位置?这至少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从政治基础上看,这是革命理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上来看,这是恢复生产、重建国家的必然要求。

(1)从政治基础上看,“劳动光荣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革命成功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决定了“劳动”是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最原始的基点。在恩格斯看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不管恩格斯所说的劳动是否创造了人类自身(手、语言、脑、科学艺术等),但至少“劳动”创造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总之,是“劳动创造世界”。这就是马恩的“创世界说”。

既然劳动创造世界,那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应当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翁了。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这样演说:“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②于光远也说:“世界的创造者,不是别人,正是劳动者,他们是人类社会的主人翁,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③马恩的“创世界说”成为劳动者重新认识自己地位的理论依据。

然而,事实上,与劳动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基础的、重要的地位不相符的是劳动者却居于被压迫的甚至是被奴役的地位,他们过着艰难的甚至是悲惨的生活。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②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

③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中),《中国青年》1949年第12期。

按道理说，社会上的一切财富既然是劳动者所创造的，那末就应该由劳动者来享受，不劳动的人们，就不应该有饭吃；社会主人翁既然是劳动者，那末一切事情就应该由劳动者来作主，而剥削者就不应该有任何政治权利；并且，人类文化的基础既然是劳动者所创造的，那末文化就应该为劳动者服务，不应该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东西。但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社会里，这一切都正好颠倒过来了。在那里，生产物质财富、创造文化的劳动者反而在挨饿受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人压迫，受人损害，毫无政治权利，而被迫处于愚昧、迷信、粗野的境地；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却吃好的、穿好的、穷奢极欲、挥金如土。^①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②而这极不合理的现象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者、剥削劳动者的罪恶制度”造成的。因此，要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使这一不合理的社会合理化，就成为共产党革命的起点和目的。

在近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劳动者的贡献和地位不相符的不合理现象，劳动者悲惨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并对他们致以同情和尊敬。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前纪念一战胜利的集会上，51岁的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讲，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说：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

①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下），《中国青年》1949年第13期。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工神圣！^①

他所列举的那些“劳心者”都是“富二代”、官员、商人、顾问、议员等上流人士。蔡为了改变人们对劳动者的贱视心理，突出劳动的神圣，强调劳动者的价值，于是拉出那些“无良的非劳动者”加以衬托。他激情澎湃地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31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蔡元培当年演讲过的地方宣告：“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工作了。”^②从此劳动者摆脱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开始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劳动创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武装斗争的手段，终于把这“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了过来”。可见，中国革命指导理论的基石正是“劳动”，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阶级，中国革命的承诺也是要使他们翻身做主，不再为地主、资本家欺压和剥削。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我们还能轻视、甚至贱视“劳动”？

（2）除“劳动”成为中共革命理论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外，从另一面看，“劳动光荣论”也是经历战争和混乱的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国家的必然要求。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生产。这是由战后恢复国家的生产和建设、确保人民正常的生活所决定的。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这一任务上去。”^③1921年列宁还说：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

①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

②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③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0页。

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①

为了增加生产，他主张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手中。在生产压倒一切的情形下，任何干扰生产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发展生产不只是战争结束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最终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长远要求。而这后一种要求，正成为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的大政方针的确立依据。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②

一心一意谋生产同样成为中国革命成功后的首要任务。远的不说，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日不处在外战、内战之中，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比战前的1937年减少了25%，轻工业生产减少了约30%，重工业的损失更大，约减少了70%，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达472.2万，我们几乎赤裸地站在一片废墟之上。刚建国时的一般干部按当时的供给制，每月工资折合成若干斤小米，扣除吃、穿、住，零用钱（外）所剩无几。一般市民的消费水平更低，据统计，1952年全国居民年人均消费额仅为76元，平均每月不足6.4元”^③。发展经济正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物质生活资料的短缺的现实所决定的，而以生产为中心自然使得劳动居于一个重要地位。

其实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

① 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169页。

③ 王冰等：《消费摇摆舞》，《中国青年》1992年第10期。

城市，可是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① 1949年3月13日的通过的《二中全会决议》中这样称：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的工作，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②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上关于恢复生产的语句上划了线，并且在页眉上写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农民，职员）的生活”的批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生产的认识和强调与列宁论述的基调完全相同。

要知道，生产问题不光关系到人民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政权能不能得到建立和巩固的问题。

可见，无论是政治上看，还是经济上看，我们都必须把“劳动”放在一个神圣而崇高的地位。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定会确立“劳动最光荣”这一重要价值观的客观要求。

身体之苦，精神之乐

即使感觉再愚钝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劳动的累与苦。“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表示拉丁语和英语中的‘劳动’的词汇，都是极端努力与痛苦相结合之意。……毫无疑问，这些词源都说明了劳动与痛苦或者厌烦的历史性联

①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

② 《二中全会决议》，中央档案馆藏。